

石佛寺是山东老潍县城的一座古刹，北宋咸平二年（999年）由僧人元德修建。当年位于老潍县城东南隅，其正门正对城墙门的寺前街（今向阳路东侧潍坊市中级法院院内）。因寺内大雄宝殿内西壁间有苏轼题跋、崔白画的《布袋和尚真仪》石刻，名扬一时。现古刹荡然无存，仅残存一些影像资料。日前潍坊文史爱好者以此图制作了2025年年历，虽系拓片，足可从中一睹崔白铁弦线条勾勒出的一个皱着眉头的奇僧形象，更兼有苏轼题跋，令人爱不释手。历史上，《布袋和尚真仪》见著于各类金石著述，围绕它引发许多考据话题。布袋和尚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？《布袋和尚真仪》这幅画又有哪些故事？今天就来梳理一下。

□张漱耳

民间有传说 文献有记载

布袋和尚，历史上真有其人，法名契此，又号长汀子，唐末五代禅僧，明州（浙江）奉化人。

民间最早的传说如下：唐末的一天清晨，奉化长汀村前江水大作，正在田间劳作的村民张重天忽然看见，江中漂浮着一朵从未见过的硕大莲花，通体金黄，散放着奇光与馨香，逆流向上游漂来。过了一会儿，金莲花不见了，消失处出现一捆柴草，上面躺着一个赤条条的小男孩，面临灭顶之灾却浑然不觉，好像躺在摇篮里一样呼呼大睡。张重天见那孩子圆头大耳，相貌端庄，非常喜爱，便将他抱回家，与妻子窦氏把他收养下来。与长汀村隔溪相对的岳林寺的闲旷禅师，为他取名“契此”。

契此成人后在江浙一带化缘，出入市镇乡村时，经常肩上背一个布袋，手拿锡杖及佛珠，人称“布袋和尚”。他身材矮胖，面容慈祥，笑容可掬，大腹便便，性格乐观诙谐，宽容大度，随遇而安，人们又称他为“欢喜佛”。

后梁末年，契此坐化于明州岳林寺前，圆寂前曾留下诗偈：“弥勒真弥勒，分身千百亿，时时示世人，世人自不识。”他生前作有许多诗偈，阐述对佛法的理解和对为人处世的独特观点，这是其中之一。

文献中，布袋和尚最早出现于《宋高僧传》卷二十一《唐明州奉化县契此传》：“释契此者，不详氏族，或云四明人也。形裁羸腰，蹙额蟠腹。言语无恒，寝卧随处。常以竹荷布囊入廓肆，见物则乞，至于酰酱鱼殖，才接入口，分少许入囊。号为长汀子布袋师也。曾于雪中卧而身上无雪。人以此奇之。有偈云‘弥勒真弥勒，时人皆不识’等句……”

也就是说契此长得身材肥胖，常用杖挑着布袋，四处乞食，四海为家，能预知未来，留下不少神迹，比如在雪中卧睡也不沾雪等。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偈语“弥勒真弥勒，时人皆不识”等句。

后《景德传灯录》进一步确认，后梁贞明二年（916年）丙子三月师将示灭，于岳林寺东廊下端坐盘石，而说偈毕安然而化。

笔下形象 南宋渐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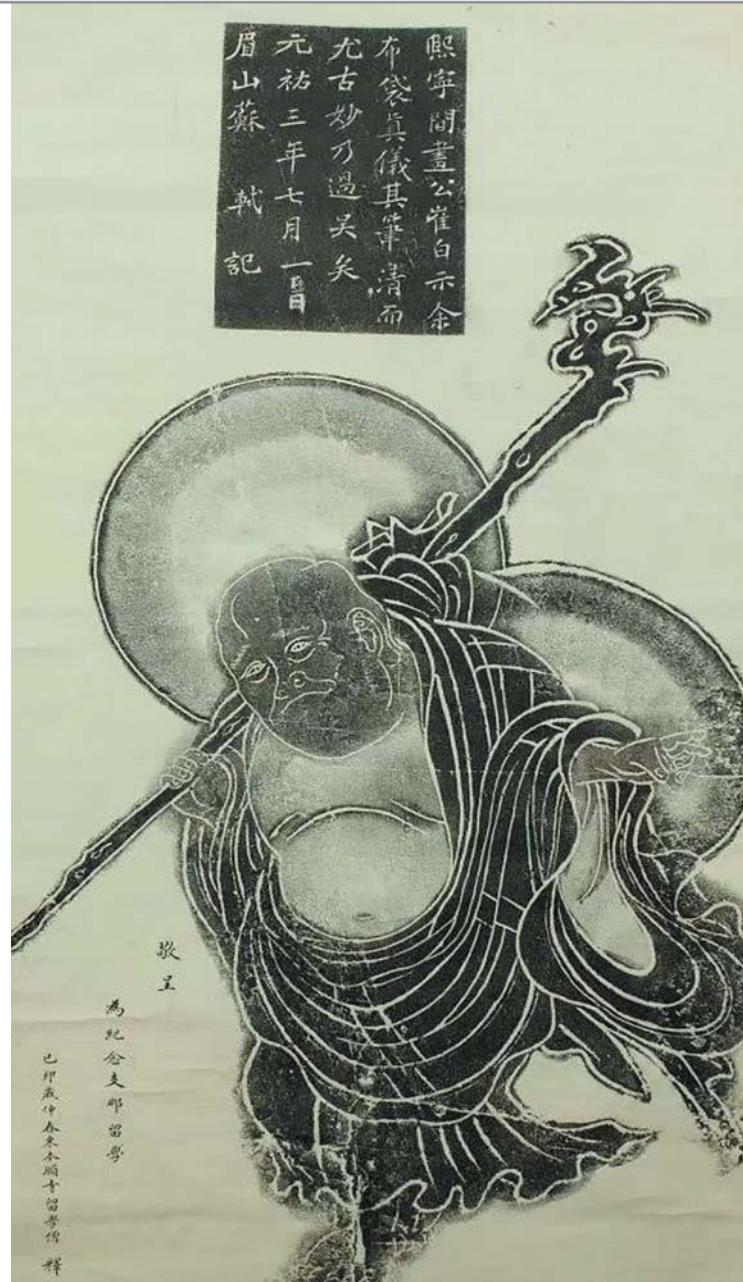
契此圆寂后，传其墓顶“累发异光，早晚均见，十分灵验”，北宋元符元年（1098年），宋哲宗赐号为“定应大师”。皇帝的赐号，朝廷的认同，让布袋和尚的名声登峰造极，尤其被大众视为“弥勒佛”的化身后，便被北宋御用画家崔白造像于画笔之下。

崔白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子西，濠梁（今安徽凤阳）人，画名在仁宗时即享有盛名。英宗治平二年（1065年），帝都开封汴河水涨，相国寺壁画坍毁，崔白与李元济参与了壁画修复与绘制，工程约在宋神宗熙宁元年（1068年）结束，完工后被召入宫廷画院，时已是六十多岁了，深受宋神宗赏识，特别指示，如果没有他的御旨，任何人都不能安排崔白作画。

《布袋和尚真仪》为崔白熙宁年间（1068—1077年）所绘，是全国创作最早的布袋和尚画像，诚为开先河之作。因为他善于写实，图中的契此应该最接近现实中的本人。

布袋和尚的布袋如何从「扛起」到「放下」

——从老潍县石佛寺《布袋和尚真仪》说起



《布袋和尚真仪》石刻拓本。

文艺全才苏轼在元祐三年（1088年）题跋，从而让《布袋和尚真仪》“字画双绝”而弥足珍贵。苏轼的跋文居画上方中央，5行37字：“熙宁间，画公崔白示余布袋真仪，其笔清而尤古，妙乃过吴矣！元祐三年七月一日眉山苏轼记。”苏轼此处的“吴”，有人解读为崔白同时代的吴元瑜，是当时的名家，曾与崔白并称“崔吴”。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应指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。苏轼夸赞崔白画技之高，超越了唐代的吴道子。

现在在我们心目中，布袋和尚是以大肚、笑口常开、慈眉善目的形象深入人心的。然而看看崔白笔下的布袋和尚，除了大肚为我们熟悉，印象最深的是一副陌生的蹙眉（皱眉）之态。可见，这经历了一个流变过程。

原来，随着“弥勒佛”化身的广泛流传，布袋和尚逐渐被赋予了慈悲、包容、欢乐的精神，导致了这些思想因素在形象上有所体现。

南宋宫廷画院待诏梁楷，率先顺应新思想，创作了与崔白不同的布袋和尚图。

梁楷生卒年不详，祖籍东平须城（今山东东平），因喜好饮酒，酒后举止不羁，有“梁疯子”之称。他虽非僧，却喜参禅，是中国写意人物画的鼻祖。他创作的布袋和尚图即水墨写意，扛着一拄杖，挑着一布袋，仍旧袒胸露腹，但已经不是皱眉的“愁苦貌”，而变成了喜乐的“笑口状”。

梁楷为布袋和尚重新定了型。以后出现的作品，精神面貌概莫如此。待到以坐姿出现，就不再肩扛布袋，而是放在地上，喻示从“扛起”到“放下”的人生智慧。更有甚者，布袋“道具”不存，喻示身无挂碍。唯一不变的是那圆滚滚的大肚子，成为一种大度的象征。成为人民心目中快

乐、和谐、幸福、自在的使者。从唐末五代后梁时期一直流传至今。

原作失传 篆刻有二

崔白与苏轼合璧之作早已失传。北宋时期将它篆刻入碑的地方两处，除了山东潍县的石佛寺，还有共城（今河南辉县）县城内天王寺内的一块石碑，碑阴有“政和戊戌释文渊书心立”字样，明确了石刻年代距离苏轼题跋已经30年。后又移立于马王庙中，今藏于百泉碑廊西侧。另外，清《寰宇访碑录》记载，在山东益都也存《布袋和尚真仪》石刻。清《攘古录》《金石彙目分编》亦同此说。但由于益都石刻未曾现身过，姑且忽略不计。

苏轼与共县的交集，见于《东坡志林·太行卜居》：“柳仲举自共城来，转大官米作饭食我，且言百泉之奇胜，劝我卜邻。此心飘然已在太行之麓矣！元祐三年九月七日，东坡居士书。”

据此共城诞生了如下说：苏轼在京师负责礼部贡举期间，受共城县令柳仲矩（一作仲矩）盛邀，专程前往品尝梅溪大米，并游览苏门山百泉圣境。临行之前，苏轼把熙宁间崔白送给他的《布袋和尚真仪》找了出来，挥笔在画上题跋后，作为送与柳县令的随身礼品。这年9月，秋高气爽，苏轼在共城柳县令的陪同下，登上苏门山，怀古晋代孙登啸台，即兴作《啸台》诗一首，并游览了百泉湖。后来那幅崔白与苏轼合璧之作失传，三十年后摹刻上石，立于天王寺。

潍县石佛寺的碑刻无具体年代，故很难说比共城碑刻是早还是晚。康熙《潍县志》这样记载：“佛宇前有布袋佛像石刻，眉山苏轼题曰，熙宁间，画公崔白示余布袋真

仪，其笔清而尤古，妙乃过吴矣手书，石刻尚存，有邑人题咏见《艺文志》。”依据苏轼跋文内容，当与共城县城天王寺石碑同源。除非当年崔白画了两幅《布袋和尚真仪》，苏轼一字不差题写了相同的跋语。显然，这种可能性极小。最大的可能是一地以另一地碑刻拓片摹刻。

苏轼与潍县的交集，潍县地方史料如此说：“宋熙宁年间，苏轼任密州（今诸城）太守两年，在熙宁九年（1076年）腊月，奉调山西永济进京，大年三十行色匆匆赶到潍州时，邂逅大雪，不得不在石佛寺借宿一宵，大年初一雪霁，又行上路。苏轼曾为此赋诗《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复雪作》。在投宿潍州十二年后，苏轼已经五十三岁，当哲宗元祐三年（1088年），一日翻检文夹，翻出画家崔白赠他的一幅布袋和尚造像。不禁忆起十二年前，于潍州石佛寺投宿情景。作为回报，不如以此相赠吧。正巧有潍客北归，托之带回。”后在原作失传前，潍州石佛寺刻碑传世。

卸任宿寺 难以置信

河南、山东两地地方史料对于获画掌故各说各，均有根有据。相对而言，因苏轼浏览共城与题跋年代相同而有一定的真实性。潍县的说辞，颇具文人想象成分。

首先，苏轼年三十在石佛寺借宿一宵就存疑。熙宁九年（1076年）年底，苏轼知密州未满两年，朝廷变法派得势，被一纸昭令贬往山西永济。赴任途中，经过潍县。他的行程计划本要在安丘董储府上过完年再到潍县。董储是原潍州太守，父亲苏洵的朋友。不料，因半年前董储已经过世，苏轼在他家墙壁上留了一首悼念诗，便惆怅离开，冒雪沿北宋官道从安丘赶往潍州。

潍州隋朝置。隋统一天下后，将全国的郡改为州，潍州作为地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长河中。但仅是昙花一现。隋炀帝执政时期就被废掉，到了唐先恢复后又废，宋朝时才作为地名固定下来。时与密州一个级别，同属京东东路，辖今潍城、昌邑、昌乐、寿光四县。疆域很小，也无多少名胜，今天的四大遗存城隍庙、十笏园、松园子、万印楼统统没有，只有这个才五十来年历史的石佛寺，俗称南寺，位于潍县城里东南隅。历史一点也不悠久，对北宋人苏轼来说毫无吸引力。所以潍州一站也就没有逗留计划。后来，有文人看到石佛寺壁间《布袋和尚真仪》，就与苏轼平生仅有的一次“潍州投宿一宵”缀结，作了掌故，说东坡当年“行色匆匆赶到潍州时，已是年除夕，邂逅大雪，不得不在石佛寺借宿一宵，因大雪阻路，在石佛寺投宿一夜，与僧人住持对酌守岁，相谈甚欢。大年初一雪霁，又行上路。”

这恐怕是想当然。苏轼当年带着妻小从安丘赶往潍州，走的官道，此时天空飘着雪花，一路上带着因父执故去产生的惆怅和遗憾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还有闲情逸致来到石佛寺？实际上，他们赶到了州驿就住下了，哪儿也没去。宋时官道驿站都有很好的服务，此前赶到安丘，就是在县城北孙十里驿留的宿。

苏轼还信奉某些天道。密州两年数次到常山祈雨就是例子。作为文学艺术的全才，不可能不知“宁可夜宿荒坟，不可夜居古庙”古语。老祖宗告诫，庙宇是供奉神灵的地方，即便没有条件都不能住庙，以免打扰了佛门清净。有住宿庙宇者，但多是穷人，主要为了那点水果糕点供品。苏轼作为地市级一把手官员，还沦落不到与人合伙住庙的地步。苏轼很尊敬佛门，又是大年除夕，委实找不到他到石佛寺投宿的理由。